

山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回忆山西青年抗战决死第三纵队·····	戎子和 (1)
决死三纵队及其前身的党的工作·····	高治国 (29)
悼念董天知同志·····	杨献珍 (38)
回忆李恽同志和互济会的革命活动·····	解玉田 (42)
回忆地下革命斗争十五年·····	杜任之 (47)
续范事将军革命史实·····	刘定安 (67)
孔繁爵先生事略·····	李冠洋 (89)
越南志士阮尚贤旅晋史实·····	师道刚 (91)
晋西北人民的喉舌——《新西北报》·····	吉 喆 张 友 (107)
太谷基督教公理会的六十六年·····	王正道 赵荣达 (134)
力空和尚传·····	傅绪昌 (151)
秋林与克难坡·····	杨怀丰 (156)
晋剧科班述略·····	赵尚文 石文鉴 (160)
质疑·补充·订正·····	(180)
第十一辑至第二十辑分类总目录·····	(183)

回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

戎 子 和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距今虽已四十二年多了，但对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三纵队的成长、战斗和在“十二月事变”中的损失，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缅怀为党和人民英勇牺牲的死难烈士，我不惜辞拙，聊草此文，以了多年心愿。

一、决死三纵队在斗争中成立

决死三纵队继决死一纵队、二纵队之后，在日军进侵雁门关、平型关，大举沿同蒲线向太原进犯时，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寿阳县成立。初成立时叫山西青年抗敌第三总队（约一个团），由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十团改编而成，总队长由原教导十团团长李冠军担任，我任总队政治委员，暂兼政治部主任。部队成立不久即开拔南下曲沃。

决死三总队的军政干部、队员是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十团原班转过来的。政治工作人员是从太原军政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其中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军事人员从团长到班长都是旧军人出身，而且是原防共保卫团的底子。学员是牺盟会会员，其中个别是共产党员。

教导十团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底成立时，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利用合法身分，做阎锡山的工作，保护我党党员，发展党的工

作。我那时在阎锡山那里是个“同志会”干部委员，为了便于工作，我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直归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在团里，只与一个同志发生关系。

阎锡山成立决死队等新军，是在我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公开的、秘密的关系向他建议的。他当时正处于困境：他的旧军在大同失陷后，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为了挽救他即将覆灭的统治，他同意了成立新军。这在薄一波写的《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一文中说得很详细，我就不再赘述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日军一下子攻破雁门关、平型关等地，突进繁峙铁甲岭时，阎锡山惊慌失措，以为日军很快就要冲到太原，因而他从太和岭口（雁门关内代县附近阎锡山行营所在地）撤退时，不敢沿同蒲线的大路走，而绕道五台，退回太原。当时太原仅有两个团，一个是干训团，另一个是什么团记不得了，等于一座空城。留守太原的赵戴文，没有办法，于同月二十八日急电调我驻寿阳的决死第三总队赶到太原参加防卫。那时日本飞机已轰炸太原，我总队赶到后，驻南郊旧正太铁路车站东南一带。我随即向山西省委张友清请示机宜。友清告诉我：“我们党不赞成死守太原，特别不赞成用山西新军来守，党正通过公开和秘密关系，向阎锡山建议，不在太原决战。”他要我见了阎锡山和梁化之等人，也提出这个意见。我见了梁向他讲了这个意见后，因为事关重大，梁也不敢表示态度，只说“你等消息吧！”

过了两天，阎锡山回到太原，情景十分狼狈。

日军攻陷繁峙县城后，因在平型关战斗和进攻原平时，损失较重，迟滞了十来天，未敢南下。这时，蒋介石已调卫立煌部从河北涿县一带赶到太原。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也继一一五师开到晋北一带，一二九师也正兼程向山西进发。阎锡山和卫立煌见面后，决定改在忻口会战。

阎锡山命令决死第三总队于十月初由太原开到曲沃。决死三

总队到曲沃后，省委指派胡西安到总队为我和省委之间的单线联系人。不久，胡即由我推荐到汾城县任县长。胡走后，省委派杨献珍接替胡的工作。杨到总队后，和我商量好，请董天知任总队政治部主任。董大概是十一月底到决死三总队的。

教导十团改编为决死三总队，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新旧两种力量尖锐斗争的。

决死三总队开到曲沃后，李冠军等人不赞成改编，认为决死队不正规，不赞成政治委员制度，不愿意有一个政委来干预他们的行动和经济管理，怕废除他们的特权。但李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一面不敢公开反对改编，另一方面仍按照教导十团一套老办法行事，遇事不与我商量。因之，在总队内，军政磨擦愈来愈烈。我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改变态度，但他执迷不悟，并不接受劝告。

李冠军其人，是一个反共旧军官，一九三六年红军东渡山西前后，他任山西防共保卫团团长，政治关系相当复杂。一到曲沃，他就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拉上了关系。平素自称他同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八期同学，他到中央军也能吃得开等等。我们见他顽固到底，不得已报告阎锡山，要求将他调离，并提议由总队三大队大队长王子玉（比较进步）接任。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下达了调离李的命令，并委任王子玉为决死三总队总队长。

李冠军接到调令后，拒不执行，不办理交接手续，每天在家里和他的几个亲信密谋策划，准备叛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李冠军带了他的几个马弁跑出城外闯进总队营盘，集合部队讲话。一时，营盘气氛十分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李嘶喊说：“要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到中条山去打游击。”“到哪里不能抗日！”煽动大家跟他走（实际上是带队伍投靠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他把部分政工人员监禁了起来，预定叛变成功后，要先进城杀害我和董天知，

事先已密令他的亲信王恒山（李派到曲沃县自卫队任军事教官的一个排长），以听见城内枪声为号，即带队伍逃跑；又密令军需官樊××携款向指定地点逃跑待命。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除急电阎锡山报告李冠军叛变外，立即抽调部分军政人员和模范队（由总队抽调积极分子组成的干部候补队）封锁了曲沃县城。这时王恒山因等不及信号，就抢先枪杀我自卫队指导员王兆祥，带队伍逃跑了。我们马上电话通知绛县县长和牺盟会特派员，立即派自卫队和警察截事王恒山。

一场叛变与反叛变的斗争，到了决战时刻，由于我党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绝大部分军人，不愿意跟李冠军叛逃，相持了一天半。第二天傍晚，阎锡山派韩栋材到曲沃，将李带回临汾，软禁起来。李自知罪恶严重，在信口上厕所时畏罪自杀了。

这次事件中，除王兆祥牺牲，军需官樊××携款逃跑漏网，王恒山在绛县被我围攻只身逃跑外，其他尚无损失。“曲沃事件”的胜利解决，为决死三总队的发展去掉了一个大障碍。

二、决死三纵队在战斗中发展

一九三七年底，决死三总队发展为七、八两个总队，又加驻运城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六团和第七团一部分改编为决死第九总队。三个总队组成为第三纵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新军教导总指挥杨爱源^①亲自到曲沃同我们研究军政干部配备问题。我们为了把部队掌握在党的手中，准备将表现好的旧军官，提升一些；政工人员中有军事经历以及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担任大队长（营长）、中队长（连长）、分队长（排长）；向八路军要来的红军干部担任政治指导员。杨爱源对干部情况尤其是军事干部的简历问得很详细，问到两位红军干部时，我们说是从杂牌军过来的，并将他们的名字也

改了，蒙混过去。研究的结果，都按我们的意见通过了。总队军政领导干部是：七总队总队长王子玉（原三总队总队长），政治主任马适安。八总队总队长刘宝堂（原教导十团中校团副），政治主任董天知暂时兼任。九总队总队长赵世铃，政治主任任映仑。赵世铃亦系防共保卫团团长，人很顽固，满脑子法西斯思想。阎锡山以他亲蒋，向不重用，后因在秋林受训，出卖决死队，始得到阎和王靖国的信任。与此同时，阎委任陈光斗为决死三纵队纵队长，我为政治委员，董天知为政治部主任，颜天明（承赅）为参谋长，（陈、颜两人大革命时，在国民第三军曾参加过党，后被徐永昌发觉，强迫脱离组织关系，颜后来重新入党）。他俩到任后，加强了政治工作。从此，军政磨擦显著减少。

决死三纵队组成后，省委具体指定黄骅指导我们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阎锡山在临汾召集军、政、民（牺盟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团结抗战，补充军队和开展敌后工作等问题。这时，阎迫于当时抗日形势，特别是他从武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回来后，兴起一脱自我创造的“独特”形式，即既不同于蒋介石，又不同于共产党的“民族革命风”。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则政称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办起“民族革命大学”。会议决定改“自强救国同志会”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扩大同志会高于领导名额，吸收部分旧军长为委员。又建立“民族革命青年团”，青年团的总团部委员，大多是牺盟会和新军决死队等负责同志；后又成立“民族革命通讯社”。会议还没有开完，因日军进攻临汾，包抄晋南，即草草结束。

临汾是晋南重镇，阎锡山原想死守，指派彭毓斌（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后，十月阎锡山派他为进攻上党地区的总指挥，负伤，下落不明）为临汾警备司令，我为政治委员，调决死三纵队参加守卫临汾。鉴于阎的旧军垮了，新军刚成立，如同不赞成死

守太原一样，我党也不赞成死守临汾。因此，我一面接受阎的指派任务，一面向阎和梁化之建议，改变死守临汾的决心。看阎的态度，是怕全国和山西人民责备，不能不装个样子，做作一番，以应付舆论。

当时，决死三纵队分驻曲沃、新绛、运城、翼城一带。二十二日接到命令后，即向临汾集中。

二十四日，陈光斗率九总队到达临汾。因日军第一〇八师团攻陷东阳关和长治后，以一个旅团，沿临屯公路（临汾至屯留）疾行西进，阎锡山改变了守临汾的主意，要陈带决死三纵队驰往阻击，并加拨旧军四〇四团附炮兵一个营归陈指挥作战。

决死三纵队由临汾出发，行至洪洞古罗一带，发现敌人已越过安泽县良马、府城，部队立即在古罗布置阵地。二十五日晨接火，我九总队和四〇四团及炮兵营与敌激战一日，双方各有伤亡。后因敌众我寡，傍晚，我军撤至浮山县境。

二十六日，临汾失守。我们部队退到浮山时，遇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周桓同志。他向我们传达了阎锡山任朱德总司令以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衔兼东路军总司令，并将决死三纵队拨归朱总司令指挥。周并传达朱总司令指示，不要我们正面死顶住敌人打硬仗，要从两旁侧击，阻滞敌人前进。我纵队属朱总司令指挥，大家从内心感到十分高兴。朱总司令对决死三纵队的成长非常关怀。二月二十八日，当纵队的模范队（属七总队编制）由曲沃转移到浮山石口子村时，为日机发觉轰炸，伤亡二十多个同志。指战员遭此打击后，非常悲痛，连饭都吃不下。朱总司令得悉后，亲自到队探视慰问，并作了讲话，对鼓舞士气、安定情绪，起了极大的作用。

临汾失守后，由于决死三纵队已由晋南逐渐转到太岳地区以及指挥关系的改变，党的关系改归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

三月一日，沿曲高公路（曲沃至高平）进攻的敌人，在侵略

沁水、翼城后，占领了曲沃。我纵队部移至浮山、山交一带。同月下旬，将七总队、八总队布置在翼城、曲沃、绛县一带，一面整训、扩军，一面袭扰曲高公路附近敌人；将九总队集中在沁水、浮山一带，相机收复沁水。

四月上旬，我九总队轻装一个大队，夜袭沁水县城。当我军接近城角时，被敌人发觉，战斗就此打响。我一个中队奋勇登城，一个分队迅速登上城墙，与敌展开战斗。敌人从两侧向我登城的指战员围击，我军在敌人强大火力猛烈攻击和后续部队又上不来，的情况下，下令撤退。不幸部分战士被敌人围住，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约半小时，我七位战士身负重伤被俘，敌人劝他们投降不成，即行枪杀。战士们就义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表现了我中华优秀儿女宁死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为民族利益甘洒热血的高贵品质。敌人一个大佐，为了利用这七位战士的勇敢和坚决精神，鼓励他的侵略部队，特在沁水县城北挖墓集体埋葬，并在墓上立了一个木牌，上写：“支那勇士之墓”。祭奠后，即仓皇撤退。我军收复了沁水县城。不几天，翼城县也相继为我军收复。

日军侵占晋南后，我决死三纵队在同蒲铁路南段两侧，临汾、曲沃、翼城、新绛、稷山、绛县、闻喜、夏县、平陆、安邑、解县、虞乡等地，展开游击战争，扩充队伍，甚为顺利。

七月下旬，以民大四分校学生游击支队和同蒲铁路职工自卫队为骨干，随后又吸收王学林在夏县、闻喜、安邑一带组织的游击队，争取了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组成游击第十团，团长是雷震（老红军团长），政治部主任先是张维汉，后是戴云程。

八月间，以在临汾、翼城、浮山、安邑一带发展的几支游击队为主，争取了临汾皇协军近一个营，组成游击第十一团。李其昌（旧军人）为团长，杨绍曾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发展了一个游

击十支队，支队长为陈稚卿（旧军人），政治部主任为陈晓。这个十支队后为陈光斗带归决死二纵队（陈晓未去），在“十二月事变”时叛变。一九三九年春，以翼城、曲沃、绛县自卫队和五专署民族革命中学组织的游击队合并编成游击十二团，团长为胡正平（老红军干部），政治部主任先是席炳午，后是贾启允。到“十二月事变”时，决死三纵队已发展到六个团，约近六千人（不算五专署两个保安团）。

日军在台儿庄会战先败。我七、八总队为配合徐州会战，会同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包围了曲沃县城。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日军从太原调来一个联队，并附属王英伪军约六千人，分南北两路为曲沃城内之敌解围。二十八日，敌进到汾河北岸我八总队阵地前沿曲村、北赵一带时，中央军的三个师只留下一个营，配合我八总队在绵岭上下、秦岗一带布防，其余部队全部溜走。七月一日，敌人越过汾河向秦岗我八总队防地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我八总队二大队阵地被突破，三大队被敌包围，我指战员奋不顾身，激战一日，毙、伤敌五百余人。我三大队大队长李荫汉、二大队副大队长王鸿猷、排长郝凯、张问高等同志不幸牺牲，战士伤亡四百余人。

正在我军与敌人血战的时候，亲痛仇快的事情发生了。国民党中央军配合我军作战的那个营，悄悄躲在我军后面，他们不但积极地救援我军突围，却在背后阻止我军撤出阵地，向我军开枪。我军在敌、顽夹击中，伤亡严重。为此，我军感到十分悲愤，特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抗议。卫不得不将这个营长扣押，交军法处审判。

秦岗战役，我军损失很重，但对曲沃、翼城一带人民印象较深，敌愤极大。时至今日，那里的人民犹念念不忘。

古罗、沁水、秦岗三次打硬仗的战役以后，我们遵照党中央洛川会议关于八路军抗日战略战术的决定和朱总司令的指示，总

结了经验，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阵地战、攻坚战是不会成功的；指战员虽然十分勇敢，而战果却很小，甚至得不偿失。因此，决定进一步学习八路军，改变战术，只打山地的、分散的游击战，不打大的、集中的阵地战。这一改变，果然效果很好。从此，我们部队打了很多小规模、漂亮的、胜利的游击战。现在只选择几次有代表性的战例来说：

一九三八年七月下旬，日军一个联队为支援晋南敌人进攻中条山，由豫北博爱，经晋城、阳城、沁水到翼城、曲沃，开辟了一条简易运输线，经常汽车往来，运输武器和给养。一日，敌人一个运输大队三百余人，载重汽车一百余辆，由阳城向沁水前进。我们侦知后，觉得这正是我军伏击的好机会。我七、八两总队各抽调一部分兵力，协同中央军李默庵部，埋伏于翼城、沁水之间的东坞岭，曲高公路南北两侧。当敌人进入我包围圈时，出其不意，突然枪炮齐发，击中为首的几辆汽车，堵塞公路。敌人发觉中了埋伏，慌乱一团，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激战一天，俘敌三十余人，其余全部歼灭，汽车全部被击毁，缴获辎重甚多。我七、八两总队活捉敌人五名，缴获部分给养。是一次很大的胜利。这次战斗我牺牲了大队指导员刘炎等若干人。

继东坞岭之胜利，我九总队伏击了一股由临汾窜扰浮山之敌。当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到我在浮山境内的伏击圈之后，我突然发起猛攻，枪炮手榴弹齐发。敌人惊慌失措，回头就跑。一小时结束战斗，打死敌军三十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步枪三十余支。我伤亡很少。我八总队也接连打了三次胜利的小战斗。一次是夜袭同蒲公路临汾至洪洞一段，毙敌四人，缴获步枪三支；一次在曲沃狄村袭击一小股窜扰之敌，缴获战马两匹；一次在翼城符册遇敌七人出来捉鸡，正在老百姓院内树下喝酒、吃西瓜时，我队用手榴弹从墙外扔进。敌人当即冲出逃走，我一直追至曲沃羊舍村，除逃跑两人外，打死三人，俘虏两人，缴获步枪五支。

俘虏的两人中，一人就是后来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吉田太郎。此外，我游击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等部队在晋南、同蒲铁路南段沿线一带破坏铁路，割电线，袭击小股敌人，也取得多次胜利。一九三九年敌人占领长治一带后，有一次，我一个游击小组在组长岳岱（清华大学学生，后来在另一战斗中牺牲了）带领下，在长治小宋村歼灭了一小股敌人，俘敌一人，缴获战马一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我兼任长治地区第五专署专员。八月，陈光斗被调回二战区长官部任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指挥部始终未组织起来，陈实际被架空）。决死三纵队司令员由颜天明担任。陈和我离开后，三纵队的军事政治工作，由颜天明、董天知负责，我的主要力量，放在专署，对纵队的工作管得就少了。

我任专员后，八月，北方局朱瑞到长治决定建立五专署党团。我任党团书记，廖鲁言、王兴让为党团成员。廖走后，补杨献珍为党团成员，领导五专署和牺盟长治中心区工作。

我任专员后，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和各总队（团）也陆续由浮山、翼城、沁水转移到长治一带这个上党小盆地来了。专区共辖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平顺、壶关、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浮山等十二个县，对三纵队的供给，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临汾很快失守，二战区长官部仓皇退到晋西，我决死三纵队没有领到军饷和弹药，即开赴前线，几千人的吃饭问题，官兵的生活费补助问题，以及子弹问题，马上发生困难，不得不向薄一波领导的三专署和驻地各县政府借钱发饷和向群众赊购粮食。同时，不得不派部队越过日军几道封锁线，费一两个月的时间从晋西、陕西宜川领取军饷和弹药。所领回的军饷，二战区长官部常打折扣，只按旧编制的人员拨发，不管新增加的编制人员。同时所谓现款，也只发一些“大花脸”票子（晋钞，印刷技术很不

好，比法币更不值钱）和“戒烟药饼”②，很少发实物。因此，新增加的部队供应和晋钞贬值的损失，就靠专署补贴了。

与此同时，专署改编了两个保安团。把壶关县游击支队编为保安九团，旧军官于文华任团长，张恒业任政治部主任。以收编的旧军卢有年部队和民大六分校的学生游击队、潞城县自卫队组成保安十团，团长卢有年，政治部主任陈学文。另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我兼司令员，王子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车敏樵任政治部主任。可以说，这是决死三纵队的一支附属部队。

决死三纵队到了长治一带后，由于环境改变，部队集中，加强了整训，迅速提高了军事素质，提高了政治水平。党组织在这个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杨献珍来到决死三纵队，加强了军政干部的培训，先办起了第二战区第三随营学校。一九三八年一月，改随营学校为民大四分校。这时党派来不少党员和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教师。如刘文华、张立森、黄其踪、殷实、叶笠、张洁等同志。同年四月，民大四分校兼办决死三纵队军政干部学校，还有一个专门训练排长、班长的训练班。至长治后，又从干校抽调梁明等同志协助办了五专署民族革命中学。

这个军政干校，基本上是仿照抗大精神办的。曾请朱德总司令到校讲过话，并数次派学员到八路军和抗大一分校参观学习。

军政干校从开办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撤销，前后共训练了一千五百余人，这些学员，在决死三纵队发挥了骨干作用。

决死三纵队党员较少。由于原教导十团、六团、七团党员不多，教导十团初成立时，仅有党员六人；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一九三八年一至四月曾停止发展了一个时期（民大四分校没有停止）。部队到长治时，才有一百多个党员（派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二十多同志未计入）。同年十月间，朱总司令到长治，要我们汇报三纵队党的情况，当郝廷珖、燕登甲两同志报告到党员数目

时，朱总司令认为发展过少。他指示我们，要大胆加快发展，“就像母鸡下蛋一样，走到哪里下到哪里，一个下几十个、几百个。”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在纵队政治部成立党务工作组，对外叫牺盟机关，抽调了几个干部，专职从事发展党的工作。到“个二月事变”前，已发展到三百余人，但党员分布很不平衡，有的总队（团）多，有的总队（团）少。一般是战士多，军事干部少。决死三纵队党员数量虽少，但质量很高。“曲沃事件”就显示了力量。“十二月事变”更是一次大的考验，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令人敬仰的事迹，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三、反投降反顽固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在侵华战略上，有重大转变。一面把兵力重点转移到敌后，加紧扫荡我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一面加紧推行诱降政策。

国民党右翼，以汪精卫为首已经投敌。一九三九年元旦前后，我晋东南三、五两专署联合召开了各界反汪、坚持抗日的群众大会。朱德总司令到会讲了话，反对汪精卫投降，表明八路军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大家鼓舞很大，更加坚定了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心和决心。阎锡山与此相反，认为抗日抗不下去了，蒋介石也要投降，与其蒋早投降，不如他抢先一步。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会议，即臭名昭著的所谓“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旧军军长以上、个别师长，新军纵队政委，行政专员以上、个别县长，牺盟中心区以上干部。薄一波和我于二月二十三日到会。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没有参加吉县古贤会议，对阎锡山的倒退还不知道，对秋林会议曾有过幻想。不料一到，就发觉“气候”不对。这次会议是阎锡山积极推行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准备投降日本的会议。会议一开始，阎讲话，就定了调

子，他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现在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

会议上，倒退与反倒退成为新旧两派斗争的焦点。斗争很激烈。旧派军人以王靖国为首，行政人员以邱仰浚、薄右丞为首，掀起了反共、反八路军，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一股阴风。新派以薄一波为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反对分裂的斗争。阎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又说：“不能说汪精卫先生是汉奸。”薄一波说：“不能说汪精卫不是汉奸”，把他顶了回去。一次开会，阎一开始就说：“二战区兵员缺乏，财政困难……。”我看他又要归结到抗战抗不下去，要投降的问题上来，就说：“兵源不足，发动群众就可以群决，只要坚持抗战就有出路。”阎听了，立即变了脸说：“戎子和！你所答非所问，我是说书，你拉二胡，音调不同。”新派的人哧哧地笑了起来，续范亭立即作打油诗一首以讽之：“戎君高论甚堪钦，可惜所答非所问，你拉二胡我说唱，音调不同各西东。”

会议从三月开到四月下旬，阎锡山一直顽固不化，新派感到讲什么也不起作用，旧派则掀起一股吹捧阎锡山的妖风，说阎是“圣人”，“圣人的话还有错误吗”，肉麻刺耳，丑态百出。会议拖拖拉拉实在开不下去了，刘定庵（以晋察冀国民党身分同胡仁奎应蒋介石电召去重庆汇报，路过秋林参加了会议）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会场情景。诗的第一句记不得了，二、三、四句是，“形形色色各自处。你打油来我画画，有人提议带枕头。”于此可见一斑。最后，阎毫不顾新派的反对，以他的奇怪的民主公式：“民主是要讲的，但最后还要以我的决定为主”，片面作出决定，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建立行政公署，缩小专区区划和专员权力，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各县的组织。

会议开完后，阎锡山本想羁留我们在秋林，后因惧怕牺盟会

和新军反对，五月中旬，才让我们离开。在我离开秋林前夕，阎锡山见我，别的话没有说，劈头就是一句：“你这次回去，千万不敢反对汪先生。”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更确信他已下决心要投降日本了。

薄一波同我回到晋东南后，对阎锡山的倒退决定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我行我素，他搞他的，我搞我的。

我们回来约一个多月，日军即开始对晋东南地区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从白晋公路进攻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在侵陷沁县、襄垣之后，七月十二日进占了长治、潞城、壶关、长子、屯留也相继失陷。决死三纵队各总队、游击团，由长治转移到长子、沁水、屯留以西一带，五专署和牺盟长治中心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和王兴让带领，随决死三纵队一起行动，领导白晋公路以西各县工作；一部分由杨献珍、张茂甫带领随保安九、十两团转移到壶关以东一带，领导白晋公路以东各县工作。

不久，孙楚的第三行署随之而来。孙是第八集团军司令，行署主任是兼任的。他带来一个宪兵团、一个警卫营，还有阎锡山的各种反动组织，什么“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等“蛇蝎蛭”^③。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务指导员也跟着来了。他们来晋东南，不怀好意，口号是“开展政权”，实际上是夺取我抗日政权；“开展党务”，实际上是搞特务活动，打击牺盟会，瓦解决死队。

在孙楚等来以前，我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对日寇、汉奸的斗争上，孙等来后，就迫使我们不但要前门拒虎，而且要后门防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用一定精力来进行反对倒退、反对分裂、反对顽固的斗争了。

秋林会议后，形势逆转。阎锡山为了要掌握决死队，挖空心思，采取了许多方法。我们也想了许多方法来对付。

（一）抓干部。抽调军队和行政干部到秋林受训，灌输他那

一套反动的东西，并在训练期间，拉拢收买、封官、利诱。我则有选择地调送人员，除他们指名要调训的（极个别的）外，我们送去的是立场坚定收买不了的，或不顶事，受训回来不起作用的。

（二）限制和捣乱我办干部教育。五专署办的民族革命中学办得很好，培训了大批干部。他害怕了，要派人接管，我们就组织全体学员和职工参军打游击去。他嫌我军政干校“抗大”化了，派“精建会”的人来担任教官，专讲“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等谬论。不言而喻，他们这一套，我们干校是不能接受的，后来就设法把他们赶走了；同时我们也以招生困难、敌后战争环境办校不易告阉，宣布学校停办。阉认为反对他派教官到干校，是杨献珍的主谋，指名要调杨到秋林工作，实是谋害。后因学校停办，杨没有上他的当。

（三）借机挑拨官兵间矛盾，企图分化瓦解我部队。我们在前方提倡军官减薪，缩小官兵生活差距。他们却在秋林大骂“艰苦卓绝是大逆不道”，又说“我发的军饷是全部的，谁打折扣，你们要找准算帐。”我们借此揭露他们克扣军饷，不按实有人数计算，只按旧有人数办理的事实，提出我们新发展的几个游击团吃什么？坑入的是他们的“大花脸”票子，不是我们。同时指出军官减薪是自愿接受的，这是进步的表现，有什么不好？对阉进行了反驳。

（四）指使其“视察员”造谣生事，做假报告。他们据此撤换我们的县长，另派他的爪牙接任。我们以铁的事实来反击“视察员”们捏造的谎言，指出他们是故意滋生是非，不执行他们撤换的命令。阉就密电孙殿英，要他暗杀我陵川县长张维汉。孙将这份电报给我看了，张得以幸免。

由于阉锡山反共，反八路军，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倒行逆施，浊流所及，我决死三纵队内部斗争也剧烈起来。